

《淳化閣帖》與清代書法臨古*

莫家良**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摘 要

《淳化閣帖》自北宋刊刻以來，即成為書家重要的學書範本，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矚目現象。歷代醉心於此叢帖的書家，可謂不知凡幾，而在臨寫的過程中，不單寄寓了尊古的理想，更表現出書家對於晉代傳統的臨仿、演繹與更新。可以說，《淳化閣帖》的流行，是崇尚晉代傳統的帖學書法得以發展的關鍵。然而，由於經過不斷翻刻，《淳化閣帖》於清代已出現嚴重失真的問題，加上碑學新潮，其地位遂隨著時人的責難而下滑，而帖學書法亦面臨重大的考驗。本文擬就清代書壇中的《淳化閣帖》為討論對象，審視其起伏興衰及所涉及的種種問題。文中按清初、清前期及清後期為序，分別討論《淳化閣帖》的臨摹如何由盛轉衰，其間亦分析清人的臨古觀、書學觀、書史觀，以便為清代《淳化閣帖》以至當時的帖學書法，作出客觀的評價。

關鍵詞：《淳化閣帖》，清代書法，書法臨古

一、前言

《淳化閣帖》（下簡稱《閣帖》）自北宋淳化三年（992）刊刻以來，對中國書法的發展可謂影響深遠。大致而言，可歸納為幾個方面。首先，《閣帖》摹刻了大量宋代以前翰墨，加上其後翻刻本與由《閣帖》衍生的大量增刪本的出現，不少

* 本論文蒙香港研究資助局贊助，並為「《淳化閣帖》的流變及其影響綜合研究」計劃成果之一（編號：CUHK4408/04H）。是次發表蒙《清華學報》審查人審稿，謹此致謝。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aroldmok@cuhk.edu.hk。

古代書蹟由是得以保存與流播。其次，宋代以後不少書家競相以《閣帖》為學書範本，以求透過閣帖、臨寫、領悟，達到取法古人的目的，故後世書風的建立，實與《閣帖》盛行息息相關。此外，由於所收書蹟以六朝為多，其中又以二王書翰為重點，故《閣帖》的流行可為二王傳統的延續與流行起著積極的作用，而《閣帖》所蘊含的象徵意義，亦不言而喻。

雖然《閣帖》在宋代以來書法的發展舉足輕重，但由於收有不少偽蹟，故一直受到批評；同時亦由於《閣帖》經過不斷翻刻，遂衍生出版本的優劣與歸屬等問題。至明代晚期，《閣帖》真偽糅雜固然不斷受人非議，而翻刻版本不佳，亦引來了不少責難，但與此同時，書家對《閣帖》的臨摹興趣卻有增無減。以董其昌為例，董氏曾多次批評《閣帖》之弊，指出《閣帖》「贗者居半」，而「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甚至「以書理作斷案」，認為《閣帖》摹刻古人書蹟，未能保存「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為正，不主故常」的晉唐人筆意。^(註1)然而，在董其昌傳世的臨古書蹟之中，臨仿《閣帖》之作卻為數不少。^(註2)可見作為彙帖之祖，《閣帖》在書家心中的地位一直崇高，而且更是臨池學古的必然選擇。

《閣帖》的盛行與書家尊尚魏晉古典傳統的態度密不可分，而當書家對於傳統的理解與詮釋出現變化時，《閣帖》的角色亦難免有所改變。清代是中國書法的變革時期，《閣帖》的地位亦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其於清代的命運，多少反映出經典傳統於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問題。近年有關《閣帖》的研究出現了高潮，其中對於傳世版本的探討尤多突破。^(註3)此文試將《閣帖》置於清代書法臨古的情境中作出討論，或可為《閣帖》的研究，作出一點補充。

1. 見黃惇選注，《董其昌書法論註》（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33），頁322、318-319。
2. 有關董其昌臨寫《閣帖》的討論，見莫家良，〈《淳化閣帖》與書法臨古〉，收於何碧琪編，《秘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1010年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3），頁182-198。
3. 近年對於《閣帖》的研究甚盛。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與藝術系自2001年先後開展了「宋拓《淳化閣帖》綜合研究」及「《淳化閣帖》流變及其影響綜合研究」兩項研究計劃，部分成果見何碧琪編，《秘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1010年紀念論文集》及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文物館，2008）。上海博物館於2003年購入美國安思遠（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所藏的《淳化閣帖》，同年召開研討會，掀起《閣帖》高潮。該研討會論文見上海博物館編，《《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研究論文稿》（上海：上海博物館，2003）及《上海文博》，3（上海：2003）。此外，近年與《閣帖》相關的圖錄、著作及論文亦相繼出版，如尹一梅編，《懋勤殿本淳化閣帖》（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仲威與沈傳鳳，《古墨新研——《淳化閣帖》縱橫談》（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出版社，2003）、何碧琪，〈佛利爾本《淳化閣帖》及其系統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0（臺北：2006），頁19-78，成果甚豐。

二、臨寫的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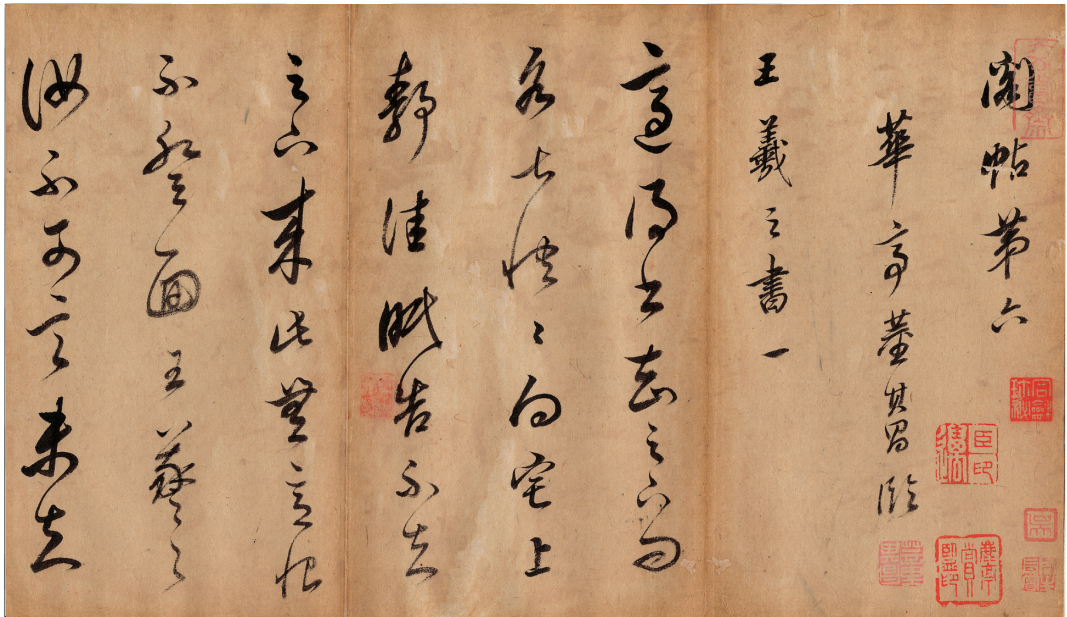
雖然滿清入主中原導致明朝覆亡，但改朝換代並不意味書法的發展必然會出現重大改變。明清之際的書法，即是如此。清初的書法風尚，基本上是晚明的延續，而清初書家之於《閣帖》，亦離不開晚明以來的習尚。順治三年（1646）陝西費甲鑄按肅刻本初拓本摹刻的西安本或關中本《閣帖》，便是始自明代末年而於清初竣工的《閣帖》翻刻，反映出當時興盛的刻帖風氣中，《閣帖》依然備受重視。至於明末清初書家對《閣帖》的鍾愛，則以王鐸（1592-1652）與傅山（1607-1684）最具代表性。目前在王、傅二人的傳世作品中，仍可見大量的《閣帖》臨寫之作，從中可見當時臨寫《閣帖》的風氣達至高峰。

王鐸與傅山醉心臨寫《閣帖》，實與晚明董其昌以來的臨古觀念相關。在晚明以前，《閣帖》臨寫之作傳世不多，主要因為《閣帖》中的短箋尺牘，皆寥寥數語，且內容多是通訊問候等日常之事，故以之作爲範本的臨池之作，其價值並不能與《蘭亭序》、《黃庭經》、《洛神賦》等經典名蹟的臨本相提並論。^(註4)但至董其昌時，隨著臨古觀念的發展，《閣帖》的臨仿漸帶有新的意義。董其昌主張「隨意臨仿，在有意無意之間」，強調以臨古尋找自我本性，並認為臨寫古帖不單可掌握古人筆法，更是追本溯源、擺脫傳統與建立個人風格的途徑。因此，在其「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的觀念下，臨寫《閣帖》已不盡是模仿學習，更蘊含了創作的成份。^(註5)董其昌的傳世作品，如藏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臨〈淳化閣帖〉卷》，若與《閣帖》對照，不難發現於點畫布置間雖有著原帖的痕跡，但同時不乏書家濃厚的個人氣息。（圖一）這種游移於離合之間的臨古方法，令《閣帖》不僅是學書的臨寫範本，更成爲書家演繹傳統的憑藉。

王鐸一生「學書以師古爲第一義」，並以古法爲變化的本源，認為「善師古者，

4. 有關明代以前臨寫《閣帖》的討論，見莫家良，〈《淳化閣帖》與書法臨古〉，收於何碧琪編，《秘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1010年紀念論文集》，頁182-198。

5. 見黃惇，《董其昌書法論註》，頁320。對於董其昌的臨古觀，論者已有詳盡研究。見朱惠良，《董其昌法書特展研究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196-200；朱惠良，〈臨古之新路——董其昌以後書學發展研究之一〉，《故宮季刊》，10.3（臺北：1993），頁61-94。



圖一：董其昌，〈臨《淳化閣帖》卷〉(局部)，27.6×268.7 厘米，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不離古，不泥古。」^(註6)其所謂「古」，實是歸宗於二王，故收載大量二王書蹟的《閣帖》，遂成爲主要的臨寫對象。錢謙益（1582-1664）曾論王鐸書法云：「秘閣諸帖，部類繁多，編次參差，蹙衄起伏，趣舉一字，矢口立應，覆而視之，點畫戈波，錯見側出，如燈取影，不失毫髮。」^(註7)王鐸對《閣帖》的精熟程度，可以想見。王鐸一生學書甚博，如《絳帖》、《紹興米帖》等古法帖，以及《集王聖教序》與晉、唐、宋等名家書蹟，無不學習，惟若論臨寫精熟，相信必非《閣帖》莫屬。^(註8)在王鐸的傳世書蹟中，臨寫《閣帖》數量驚人，無論是早期或晚年的作品，大都不是規行矩步的臨池學習之作。（圖二、三）正如王鐸自說：「倣古不盡擬其形似也」，這些臨古之作皆不追求點畫位置上與原帖的肖似，其意實在於似與不似之間。^(註9)就部分痛快淋漓的作品而言，所謂「臨寫」甚至已脫離了臨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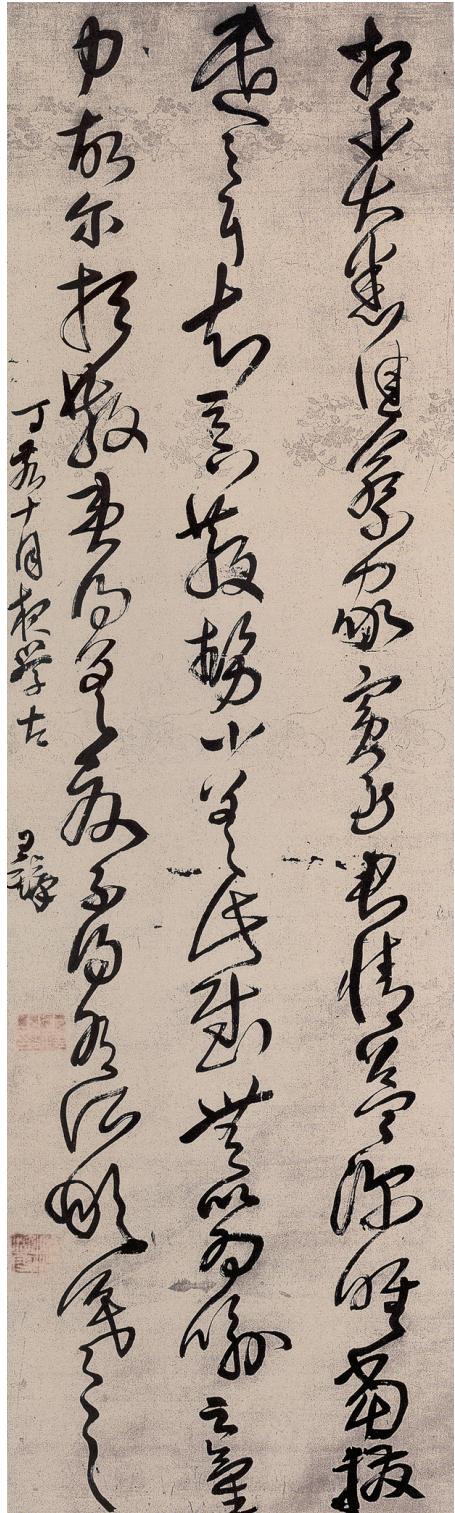
6. 見王鐸於〈草書冊〉（北京首都博物館藏）及〈琅華館帖冊〉（1641，香港盧白齋藏）的自跋，載於黃思源編，《王鐸書法全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第5冊，頁1648、1650。

7.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誌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續修四庫全書》第1391冊），卷30，頁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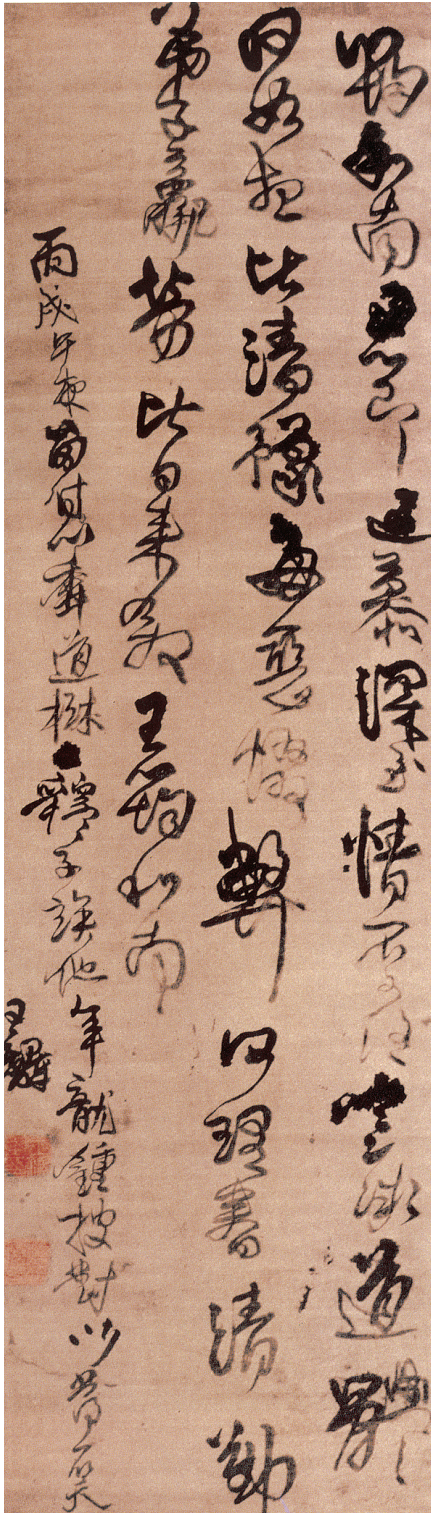
8. 有關王鐸與《閣帖》的專論，見曹軍，〈王鐸與《閣帖》〉，收於上海博物館編，《《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研究論文稿》，頁150-155。

9. 王鐸自跋於〈臨古帖卷〉（1647，廣東省博物館藏），見黃思源編，《王鐸書法全集》，第5冊，頁1668。

圖三：王鐸，〈臨王羲之〈蔡家寶〉等三帖〉，河南省博物館藏。載《王鐸書法全集》，第4冊，頁143。



圖二：王鐸，〈臨王筠帖〉，1646，173.5×49厘米。載《王鐸書法全集》，第3冊，頁749。



學書的常規，變成了發揮個性、表現創意的手段。可以說，《閣帖》的「範本」角色在這些作品中變得模糊，其所載的古法帖，儼然成爲與古人比肩的工具。王鐸曾說：「余于書、于詩、于文、于字，沉心驅智，割情斷欲，直思歧彼室奧。恨古人不見我，故飲食夢寐之。」^(註 10)以己意臨寫與演繹《閣帖》，無疑正是王鐸與古人溝通的一種方式。

傅山臨寫《閣帖》的作品數量亦不少。據研究，除了《閣帖》第一卷的書蹟不見有臨寫外，傅山傳世臨寫《閣帖》的書蹟，包羅了各卷中的古法帖，其對《閣帖》的用功，實不難想像。^(註 11)傅山對書法傳統同樣涉獵甚博，除了歷代名家外，更透過各重要刻帖，如《絳帖》、《東書堂帖》等，學習古人書法，其中尤以二王傳統爲鵠的。傅山論書，最惡軟美之態，其「四寧四毋」之論，謂「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代表了個人對時尚流風的不滿，亦透露出對傳統的理解。^(註 12)對於二王傳統，傅山終身不曾離棄，其眾多的《閣帖》臨寫之作正是最佳寫照。從傳世的例子可見，傅山臨寫《閣帖》亦如王鐸般不執於形似，其晚年對《閣帖》的精熟，更到了隨意所適的境界，其中部分作品更將古帖轉化爲連綿草，筆力千鈞，氣勢磅礴，然於縱橫開合之間，又隱然與原帖有著微妙的契合。(圖四、五) 傅山論書曾說：「字與文不同者，字一筆不似古人，即不成字」。^(註 13)可以相信，傅山的所謂不能不似古人，並非在於僵化的形似，故即使是臨寫《閣帖》，仍可以自由揮灑，任意馳騁。傅山「似與不似間，即離三十年。青天萬里鶴，獨爾心手傳」的詩句，或可作爲其學書心跡的註腳。^(註 14)

從王鐸與傅山的例子可見，《閣帖》確是明末清初書家學古與變古的憑藉。無論是對臨、意臨或背臨，二人筆下的《閣帖》作品均體現出書家的獨特書風與神采，可見臨做古帖並無窒礙個性的發揮。王鐸與傅山樂此不疲地臨寫《閣帖》，亦足見《閣帖》於彙帖的殿堂地位。傅山曾說：「古人法書，至《淳化》大備。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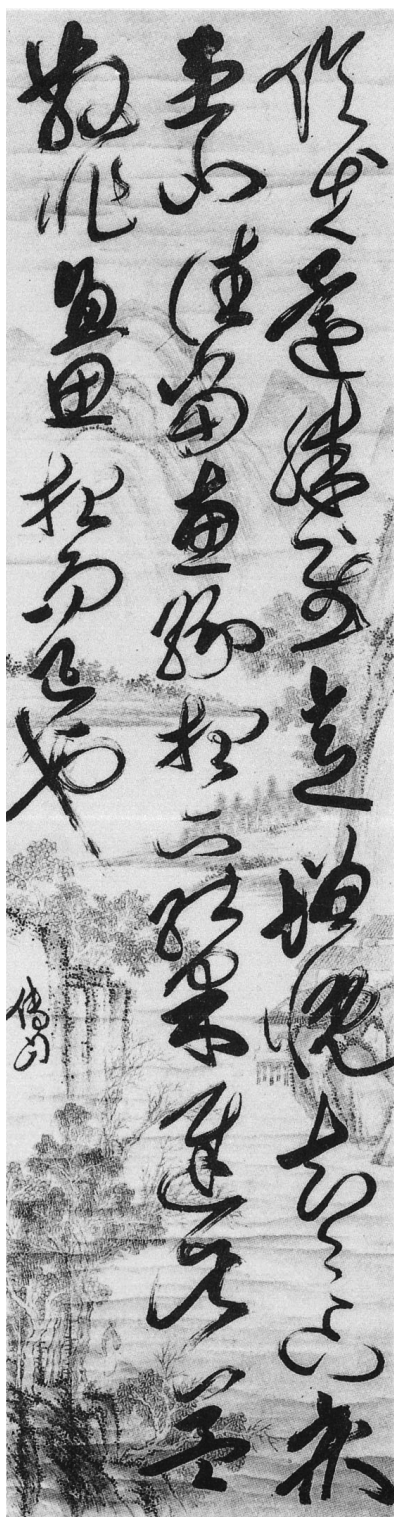
10. 王鐸，〈〈瓊蕊廬帖〉跋〉，見村上三島編，《王鐸の書法》（東京：二玄社，1998），冊編，頁 88。

11. 見李潤桓，〈傅山書藝與《閣帖》〉，收於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375-3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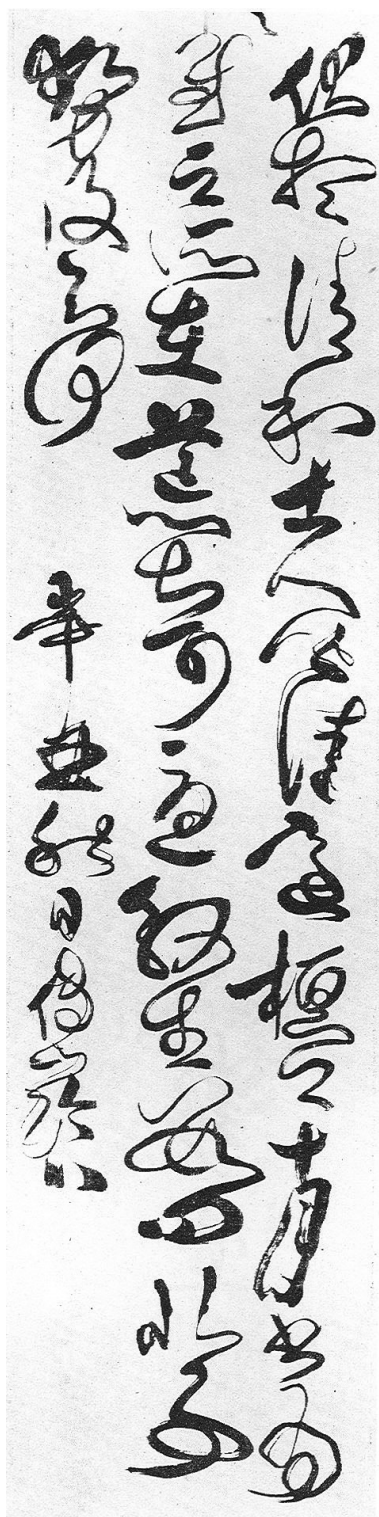
12. 傅山的「四寧四毋」爲謂「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見傅山，《霜紅龕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續修四庫全書》第 1395 冊），卷 4，〈作字示兒孫〉，頁 2。

13. 傅山，《霜紅龕集》，卷 25，〈雜著〉，頁 16。

14. 傅山，《霜紅龕集》，卷 14，〈哭子詩之十三〉，頁 10。



圖五：傅山，〈臨王羲之〈采菊〉、〈增慨〉帖〉，202×52.4厘米，遼寧省博物館藏。載《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5冊，遼一-3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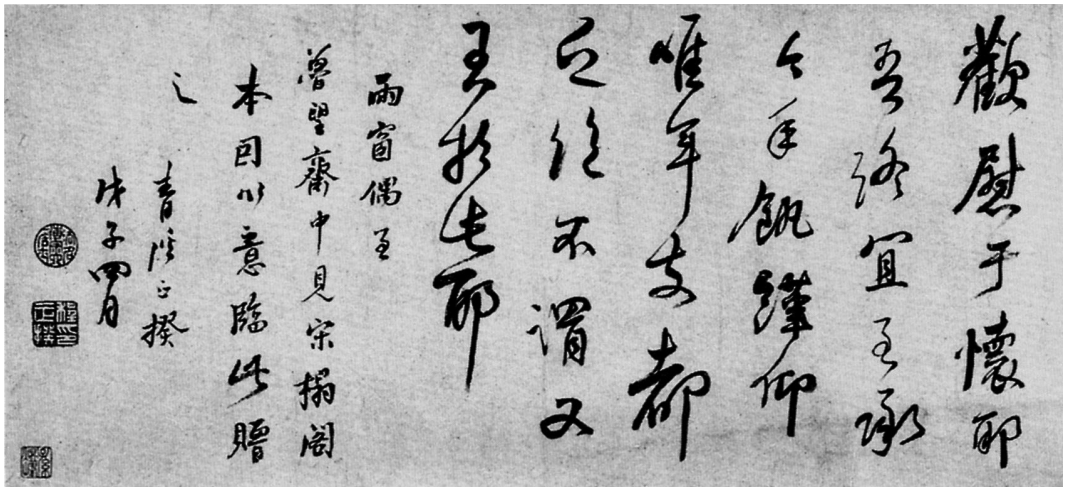


圖四：傅山，〈臨王羲之〈伏想清和帖〉〉，180×47厘米，晉祠博物館藏。載《中國書法全集》，《傅山卷》，圖26。

後來樵勒，工拙固殊，大率皆本之《淳化》。」^(註 15)此話相信可代表當時其他書家的看法。當然，若就動機而言，王、傅二人臨寫《閣帖》亦不盡是為求學古變古，因為其中有不少只是為著酬應而隨意書寫，正如王潛剛論王鐸云：「覺斯之書，興到則書自作詩，酬應則背臨《閣帖》一段」，但不可否認，《閣帖》成為了酬應書法的常客，亦側面反映出時人對《閣帖》的鍾愛。^(註 16)

清初臨寫《閣帖》的風尚，亦可從其他書家臨寫《閣帖》的傳世作品中，得見一二。其中程正揆(1604-1676)之例頗有代表性。該卷書法書於戊子年(1648)，程氏於卷末表明是「意臨」之作，全卷寫來甚多己意，確不是忠實的臨摹。(圖六)卷後錢謙益跋云：「近日詞林樵倣閣帖者甚眾……端伯宮相所樵右軍諸帖，信筆揮灑，有龍跳虎臥之勢，此真得無師之智，可解日摹蘭亭之誚矣。」於讚譽之餘，透露了當時《閣帖》盛行的景況。另有宋之繩(1643年榜眼)一跋，則云：

昔人謂臨書如雙鵝並翔，青天萬里，各極所至。又以於似中求不似，不



圖六：程正揆，〈臨王獻之〈地黃湯〉、〈阿姨〉、〈鄱陽歸鄉〉等帖〉(局部)，1648，22.1×198.2厘米，上海博物館藏。載《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4冊，滬1-2400。

15. 傅山，《霜紅龕集》，卷18，〈補鑄寶賢堂帖跋〉，頁1。
16. 王潛剛，〈清人書評〉，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804。有關傅山的應酬書法，可參考白謙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臺北：石頭出版社，2004)，頁284-292；白謙慎，《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白謙慎，〈從傅山和戴廷枋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上、下)〉，《故宮學術季刊》，16.4(臺北：1999)，頁95-133；17.1(臺北：1999)，頁137-156。

似中求似，有難易之分，正要誠懸書蘭亭詩，正要無一筆似右軍也。程前輩得書家三昧，此卷當合觀，規矩神理之間，似不似各有至到處。

正道出了清初的臨古觀念。事實上，其他如戴明說（約 1605-1660）、王無咎（1646 進士）、姜如璋、方亨咸、查士標（1615-1698）等的傳世《閣帖》臨寫書蹟，無論是承王鐸、傅山習尚，或是接華亭流風，都是以此臨古的原則書寫。（圖七至圖十一）可以說，《閣帖》為不同書家提供了接近古代傳統的途徑，並造就了各自精彩的個人書風。

三、風氣的延續

明末清初臨寫《閣帖》之風，於清代前期一直延續，當時書家普遍認同《閣帖》於保存魏晉書蹟的至高地位，而臨摹與觀摩《閣帖》乃是學古的重要方法。代表書家如姜宸英（1628-1699）與陳奕禧（1648-1709）聲名甚顯，其學書之法離不開對古帖的臨倣與揣摩，可作為《閣帖》盛行之例。姜宸英不少題跋都是書於臨帖之後，並常與《閣帖》有關。例如其〈臨宋儋書題後〉，應是臨摹《閣帖》卷四宋儋的〈接拜帖〉，其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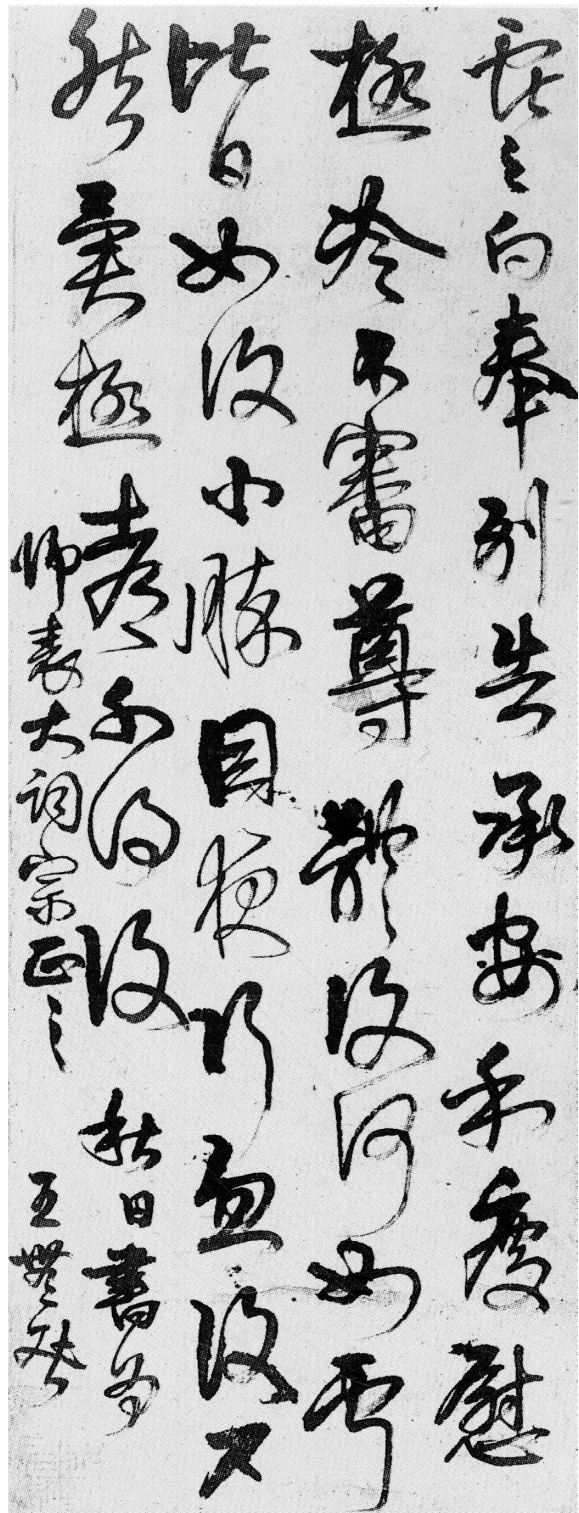
此宋儋，唐開元時人，與李璆齊聲，李師王，宋師鍾，李書今不傳，而宋真跡惟《閣帖》存此二十一行。《閣帖》置古法帖中，列於衛夫人之前，則尚未知其為人也，然其書自有六朝間風味。（註 17）

顯露出對《閣帖》書蹟的鑑賞識見，以及唐人書法源於六朝的觀點。又如其〈臨孔琳之書後〉，所臨者相信是《閣帖》卷四孔琳之的〈日月帖〉，姜氏跋曰：「孔琳之字彥林，草行師於小王……《閣帖》僅得此數行，人少習者，以其語非吉祥。」（註 18）姜氏臨寫孔琳之帖，當亦不脫孔氏與小王書法的淵源。另姜宸英有乙亥年（1295）一跋，亦是臨寫《閣帖》所記：「寒威稍霽，紙窗西照，執筆欣然。得《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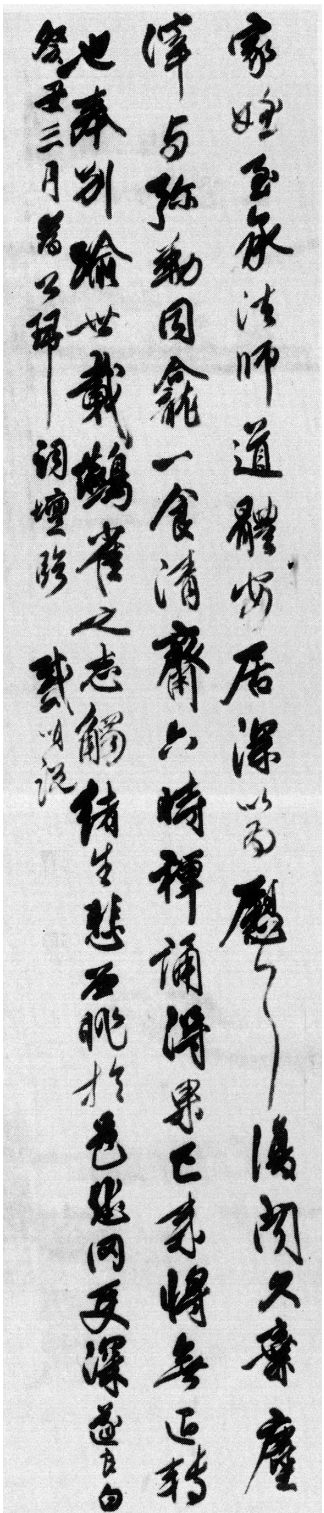
17. 姜宸英，〈湛園書論〉，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臨宋儋書題後〉，頁 4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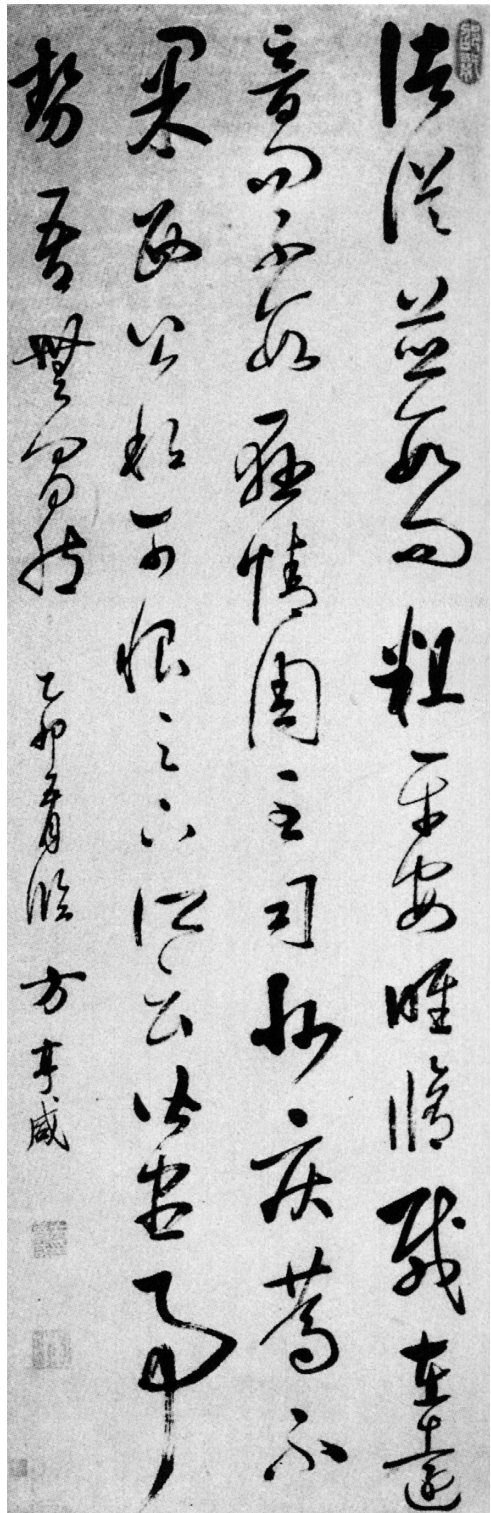
18. 姜宸英，〈湛園書論〉，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題孔琳之書後〉，頁 471。

圖八：王無咎，〈臨王獻之奉別帖〉，122.8 X 46.8 厘米，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載《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9冊，津7-16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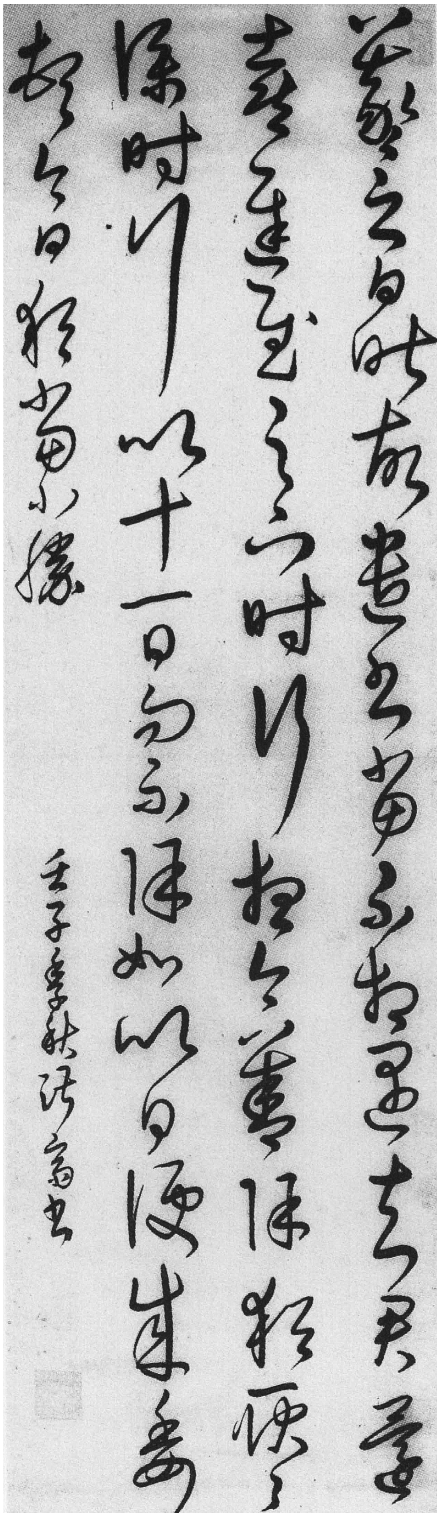


圖七：戴明說，〈臨褚遂良家姪帖〉，1673·269 X 51 厘米，天津市楊柳青畫社藏。載《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8冊，津5-04。





圖十：方亨咸，〈臨王羲之〈諸從帖〉〉，1675·175.5×58.5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載《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22冊，京1-4119。



圖九：姜如璋，〈臨王羲之〈昨故遺書帖〉〉，1672·173.5×50厘米，山東省博物館藏。載《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6冊，魯1-202。

帖》，僅臨晉魏間書數種，愛其遒秀，發於淳古也。」^(註19)不難想像當時臨寫《閣帖》往往是興之所至的日常快事，直是風雅生活的一部分。姜宸英亦嘗論臨古之法：

古人仿書有臨有摹，臨可自出新意，故其流傳與自運無別；摹必重視重規疊矩，雖得形似，已落舊本一層矣。然臨者或至流蕩雜出，摹者斤斤守法，尚有典型。予於書非敢自謂成家，蓋即摹以為學也，傳與不傳殊非意中所計。^(註20)

目前所見姜宸英書蹟，便有臨《閣帖》中王羲之的〈伏想清和帖〉，結體較原帖修長，雖強調連綿用筆之勢，但不若王鐸或傅山般的恣意揮灑，於離合之間演繹了右軍流逸的書風。(圖十二) 正如姜氏謂「臨二王書，須略得晉人幾分筆意，正以蘊藉為宗，若專務險勁，但論氣質，便似唐人效劉義慶作《世說新語》，雖詞條豐蔚，終難合也」，所崇尚者，乃六朝書法蘊藉閑雅的風姿。^(註21)

陳奕禧的書學觀與姜宸英相近，而其「以勤入，以虛受，以摹仿就，以參悟成」四語，總結了學書心得，其中「以摹仿就」一語足可作為其一生勤於臨帖註腳。^(註22)陳奕禧為海寧望族，碑版文字收藏極富，加上性嗜作書，故於古帖手摹心追以為樂。陳氏曾論王獻之書時說：「大令之書，自稱其父……今之真跡鮮矣，無從考其撇拓之法，惟原刻《淳化》、《大觀》，尋味轉折處，庶可得其內外之辨。」^(註23)故臨寫《閣帖》，當是領略古人筆法的途徑。從文獻可見，陳氏臨古甚博，其中有〈臨張芝〉、〈臨王氏諸帖〉、〈臨郗鑒〉、〈臨晉人法帖〉、〈臨郗愔〉等，應是對《閣帖》的臨仿。^(註24)另有〈臨閣帖自題〉一段，可作為其臨仿的明證：

臨摹之事，非熟知古人深意，不能稱手而出。由宋而唐，上溯愈難，蓋晉法簡，貴中含蘊藉，須縮筆撇衄，方能入其門庭。戊子改補，重來京

19. 姜宸英，〈湛園書論〉，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臨帖後書〉，頁4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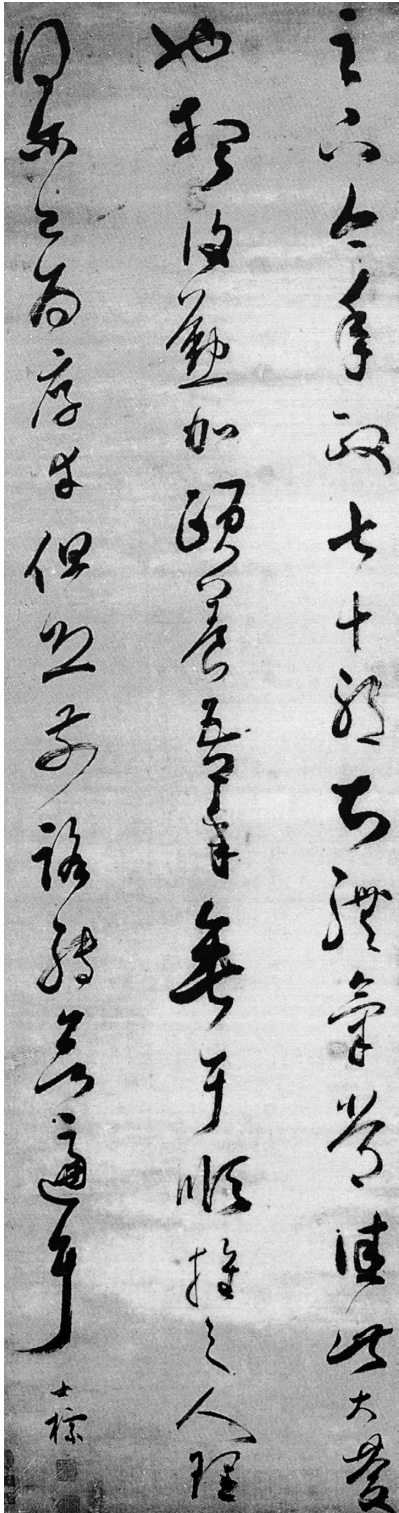
20. 姜宸英，〈湛園書論〉，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書自作書後〉，頁468。

21. 姜宸英，〈湛園書論〉，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臨聖教序跋後〉，頁4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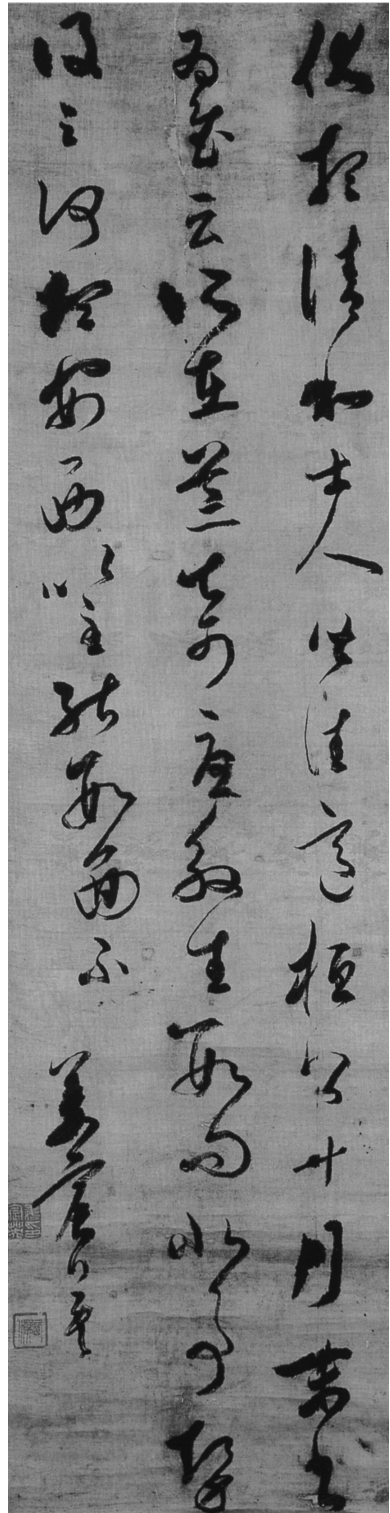
22. 陳奕禧，〈綠陰亭集〉，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題自臨米書方圓庵記〉，頁484。

23. 陳奕禧，〈綠陰亭集〉，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自書與伊學庭孝廉雜題〉，頁476。

24. 皆見陳奕禧，〈隱綠軒題識〉，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頁494-495。



圖十一：查士標，〈臨王羲之〈七十帖〉〉，17.5×51厘米，江西省博物館藏。載《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8冊，贛一一9。



圖十二：姜宸英，〈臨王羲之〈伏想清和帖〉〉。載《甄藏拍賣目錄》。

師，時迫務繁，未嘗為人臨摹，以其費時失事，故概為辭卻。六月廿八日，聚于怡齋，暑殘秋近，天氣稍解，且良朋娛心，清歌悅耳，侑我筆研，興頗不乏，遂檢《閣帖》作此。方其對原跡，而仿佛似為所拘；及真本既離，獨觀成翰，則箋素中疑有妙音發乎頓放之際。此一時之雅韻，書于冊後，後之覽者，或亦有欣羨之思云。(註 25)

「為人臨摹」固然有酬應的成份，但亦是一種良朋雅聚下的賞心樂事，而《閣帖》則是這種雅事中的上佳選擇。至於其臨仿《閣帖》之作可以「獨觀成翰」，當亦見當時視臨仿作品具有獨立欣賞價值的時代風氣。

以《閣帖》作為臨池參考，一直是清代前期書家的學書方法。康熙時翁振翼有「法帖以《淳化閣》為正，苟能寢食其中，足矣」的說法，足以說明《閣帖》備受尊崇的程度。(註 26)與陳奕禧同時的石濤(1641-1718)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選臨了《閣帖》卷二、卷四及卷五中智果、衛夫人、程邈、蕭子雲、鍾繇諸帖。(圖十三)石濤於繪畫主變化，強調「我法」的重要，此卷書法書風樸拙厚實，雖臨寫而有強烈的個人意趣，即使不選二王帖，其精神無疑與當時書法臨古的風氣相合，亦可見當時臨寫《閣帖》的風尚。當時於書壇頗有地位的楊賓(1650-1720)嘗論臨帖曰：「臨帖不在得其形，而在得其神，欲得其神，先得其意，意得，神斯得矣，否則終屬優孟衣冠。」(註 27)其法與當時潮流無異。對於臨池範本，則謂：

法帖以逸少〈黃庭〉、〈東方贊〉、〈聖教序〉、〈樂毅論〉為主，而附之以子敬〈十三行〉，伯施〈廟堂碑〉、〈破邪論序〉、信本〈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虞恭公〉小字墓志銘、〈九成宮醴泉銘〉、〈定武蘭亭〉、登善〈穎上蘭亭〉、〈黃庭〉、〈孟法師碑〉、〈枯樹賦〉、〈陰符經〉、〈度人經〉，再觀《澄清堂》、《淳化閣》、《絳帖》、《戲魚堂》、《太清樓》諸帖，以盡其變，其餘皆可不觀。(註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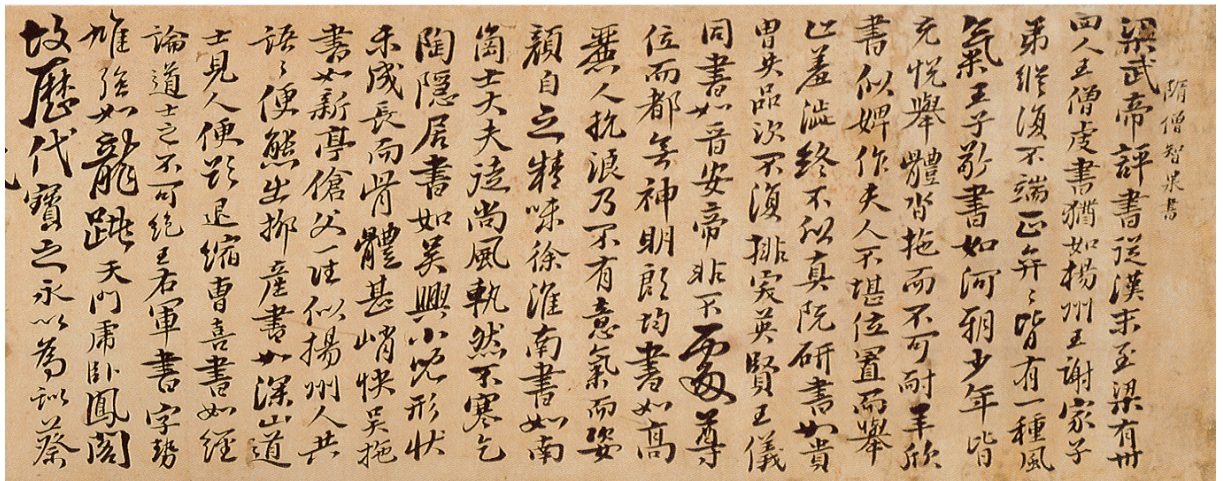
這種遍參唐晉法書的集大成之法，應是當時的學書主流。較為特別的是，楊賓將

25. 陳奕禧，〈綠陰亭集〉，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臨閣帖自題〉，頁 478-479。

26. 翁振翼，〈論書近言〉，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頁 523。

27. 楊賓，〈大瓢偶筆〉，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 548。

28. 楊賓，〈大瓢偶筆〉，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 547-548。



圖十三：石濤，〈臨《淳化閣帖》卷〉（局部），1696，24.5×350.4 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載《至人無法——故宮上博珍藏八大石濤書畫精品》，圖版 93。

各種法帖，按其重要性與作用分為三類，其中《閣帖》與其他大型彙帖同被列於經典書蹟後的第三類，相信是因為彙帖所收古法帖甚多，有利於書家於學書的後期尋求變化。楊賓另有一句較精簡而相似的說話：「學書須從〈化度〉、〈醴泉〉入門，而歸宿於〈黃庭〉、〈聖教〉，再以《閣帖》變化之，斯可矣。」^(註 29)可見於眾多彙帖之中，始終以《閣帖》為最重要。楊賓個人最愛右軍〈聖教序〉，以其「神、氣、骨、肉、血五者全具」，而《閣帖》始終有「愈翻愈舛」與真偽相雜之弊，惟在完整的學書過程中，《閣帖》實有其重要的作用，不可廢棄。^(註 30)

稍後的王澐（1668-1743）對《閣帖》亦相當重視，其《淳化祕閣法帖考正》為清代考證《閣帖》的最詳盡著作，不單融會前人如米芾（1052-1107）及黃伯思（1079-1118）的成果，亦提出新的見解與觀點，對《閣帖》的研究頗有貢獻。王澐一生學書甚博，曾謂「余寓目之帖，約三千餘種」，所臨之帖自不在少數，嘗自述臨帖之法：「余嘗說，臨古不可有我，又不可無我，兩者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故臨帖不可不似，又不可徒似。始于形似，究于神似，斯無所不似矣。」^(註 31)傳世王澐臨寫《閣帖》之作，可見於其《積書巖帖》之中，其中所臨六朝名

29. 楊賓，〈大瓢偶筆〉，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 548。

30. 楊賓，〈大瓢偶筆〉，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 548。

31. 王澐，〈翰墨指南〉，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頁 631；王澐，〈虛舟題跋〉，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臨聖教序〉，頁 667。

家之帖，不少是從《閣帖》而來。^(註 32)對於王澐來說，《閣帖》中的草書最具參考價值，曾曰：「余爲草書，一以《十七帖》爲宗，兼取〈絕交〉、〈書譜〉、《淳化》諸帖，毋令徇規改錯，不墨守規矩，無以致神明，臨古者知之。」^(註 33)《閣帖》中的六朝書蹟，皆爲草書札，乃後世書家眼中的正宗草書，其價值自不待言。王澐另有《金石文字必覽錄》，列出五十餘種碑版，曰：「自秦、漢以至元、明，碑版幾盈千萬，學者何能遍觀，茲特就其精者，略舉一二，使學者知此五十餘種爲布帛菽粟，必不可已者也。」^(註 34)雖然王澐沒有指出排列先後的意義，但《閣帖》在這碑版名錄中位列第一，想必代表《閣帖》於王澐心中的地位。

臨寫《閣帖》無疑已成爲清代前期書家日常之事，既是臨池學古，又可滿足適意遣興、酬酢應索的需要。此學古之風至乾隆時依然不衰，並見於宮廷之中。清朝內府所藏的《淳化閣帖》甚多，多藏置於懋勤殿之中，供皇帝觀摹臨寫，亦作爲皇子皇孫習字範本。^(註 35)乾隆皇帝一生臨池甚殷，對《閣帖》尤爲著力。書於乾隆十四年（1749）的〈旃闕、宰相帖〉，是其中一例，此幀作品將兩則帖文連續臨於一軸，與清初王鐸、傅山的臨寫方法相似。（圖十四）其後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更先後三次臨寫《欽定重刻淳化閣帖》，據乾隆御書題跋，可知其對臨寫的自評：

《淳化閣帖》凡臨三次。初臨略似，再臨略不似，三臨全不似，然予以全不似者爲佳，蓋略似者得其形，略不似者去其形而得其情，全不似者脫其情而契其神。箇中業苦惟閱歷者知之，不足爲外人道也。^(註 36)

其「以全不似者爲」的看法，與晚明以來的臨古觀念相當一致。乾隆臨寫所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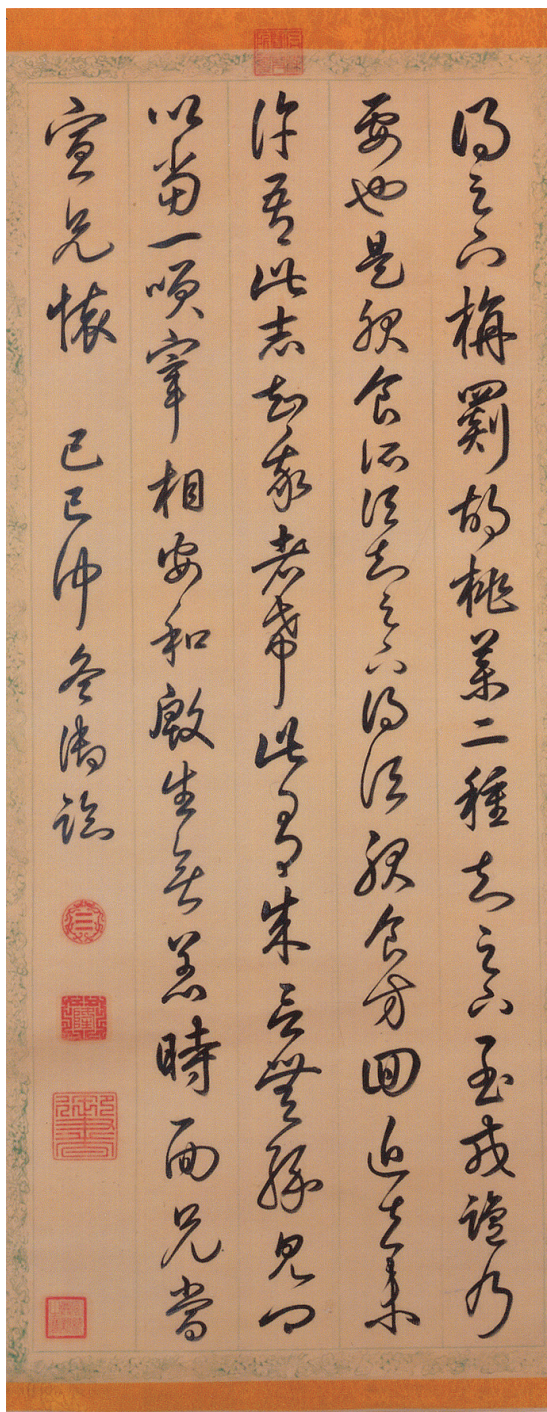
32. 有關王澐《積書巖帖》的討論，見何傳馨，〈王澐《積書巖帖》及其書學初探〉，收於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425-447。王澐另有臨《閣帖》一冊，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第 1 冊，編號京 1-170，惜不見圖版刊出。

33. 王澐，〈竹雲題跋〉，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草書第九〉，頁 637。

34. 王澐，〈翰墨指南〉，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頁 631。

35. 有關清宮所藏《閣帖》的相關討論，參見尹一梅，〈故宮藏懋勤殿本《閣帖》研究〉及施安昌，〈清朝內府藏《淳化閣帖》〉，分別收於何碧琪編，《祕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 1010 年紀念論文集》，頁 101-112 及頁 113-121。

36. 施安昌，〈清朝內府藏《淳化閣帖》〉，收於何碧琪編，《祕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 1010 年紀念論文集》，頁 115。



據的《閣帖》，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敕命重新摹刻版本。該翻刻是繼康熙時《懋勤殿法帖》與乾隆十五年（1750）《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之後的另一清代大型官方刻帖製作，據說是按內府舊藏的賜畢士安本《閣帖》重刻。在重刻之餘，乾隆更於法帖的編次上作出改變，並為各帖依字添加楷書釋文，以及於卷末附釋文考異和御製題跋。據御題所稱，在眾多的古代刻帖中，以《閣帖》為最佳，“遠出《大觀》、《太清樓》諸本之上”，而該次重刻主要是鑑於《閣帖》“翻刻愈繁，真意寢失，有志追摹者，末由津逮……爰特敕選工鉤摹上石，冀復舊觀。”（註37）同時，亦因王著（?-990）“昧於辨別，其所排類標題，舛陋滋甚，不當聽其沿譌，以誤後學”，故為《閣帖》詳加考正，並附釋文，“是於考文稽古之，中兼寓舉墜訂譌之益，用嘉惠海內操觚之士焉。”（註38）從宏觀的角度看，乾隆重刻《閣帖》實是繼承了以往官刻《閣帖》的傳統，帶有宣揚文德致治的目的，而此套彙帖的殿堂地位，亦因此而得以再

◀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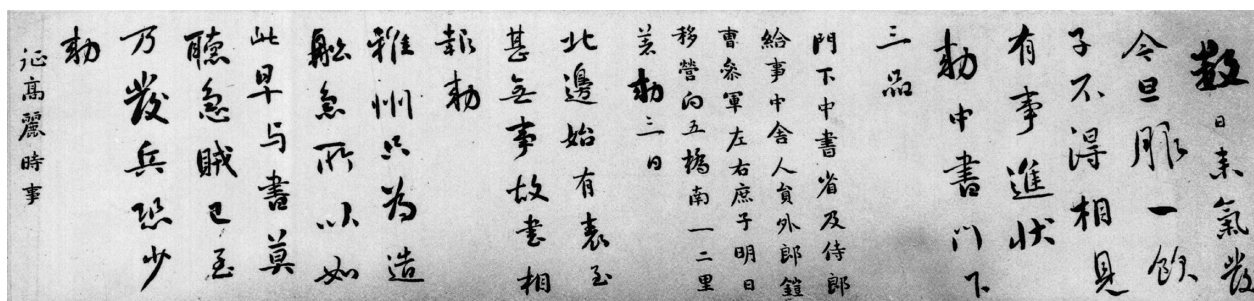
乾隆，〈臨王羲之〈旃罽〉、〈宰相〉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載《祕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1010年紀念論文集》，頁119。

37. 見容庚，《叢帖目一》（香港：中華書局，1980），頁39。

38. 見容庚，《叢帖目一》，頁39-40。

次確定。(註 39)雖然乾隆的重刻本沒有帶出《閣帖》高潮,但作為官方的大型刻帖,其象徵意味實不容忽視,加上乾隆以身作則,多次臨寫《閣帖》,對於當時以至隨後嘉慶時的皇孫貴胄與文人士大夫來說,無疑會產生一定的指導性影響。

王文治(1730-1802)曾跋《閣帖》謂「日夕玩之,可以得前人運腕之妙,洵臨池家所不可少」;「前人攻擊《閣帖》者甚多,然考據雖疏,書格獨備,且重摹之本,每本必具一種勝處,自是臨池家指南。後世學書者,未能精熟《閣帖》,不可與言書。」(註 40)對《閣帖》可說是推崇備至。同時的王昶(1724-1806)亦云:「能將〈蘭亭〉、〈聖教〉、〈興福〉三碑臨摹十年,再寫智永〈千字文〉及《閣帖》中右軍字,服膺終身,便是汝得吾髓。」(註 41)這些看法相信可代表不少乾隆時期書家的心聲,而無論朝內朝外,《閣帖》必定是書家臨池所必習的範本。就以臨帖廣博見稱的劉墉(1720-1804)為例,其傳世作品便不乏臨寫《閣帖》之作。這些作品多是晚年所書,臨寫時每以己意為之,書風厚拙古樸。瀋陽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劉墉書法,部分內容即來自《閣帖》卷一所收的數幀唐太宗(627-649在位)帖,包括〈氣發帖〉、〈移營帖〉、〈北邊帖〉與〈雅州造船帖〉等,用筆沉厚圓潤,風格樸實,甚具自家本色。(圖十五)又如稍後的成親王永理(1752-1823),則有嘉慶八年(1803)的一卷書法,乃是選臨《閣帖》中晉、宋、齊、梁、唐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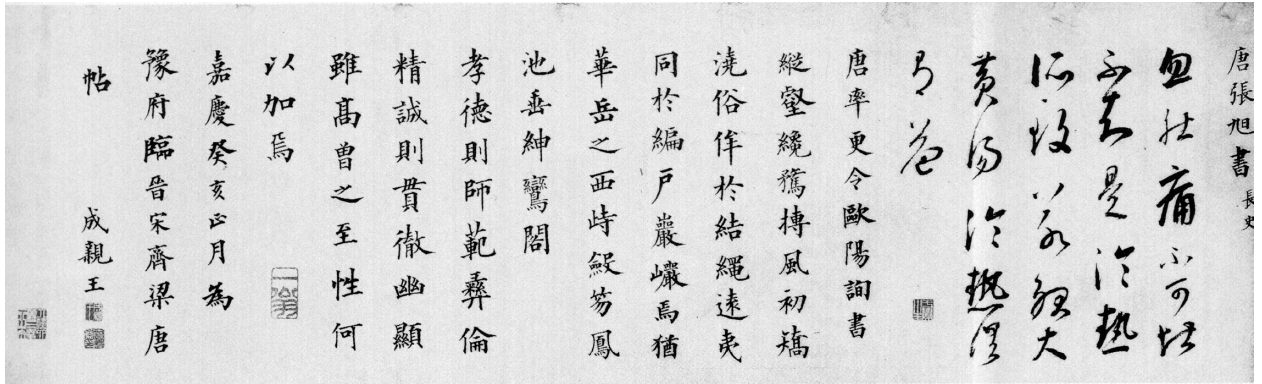


圖十五：劉墉，〈行書臨帖〉(局部)，408.5×21 厘米，瀋陽故宮博物院藏。載《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5 冊，遼 2-352。

39. 有關《閣帖》象徵文德致治的功能，參見莫家良，〈南宋刻帖文化管窺〉，收於游學華、陳娟安編，《中國碑帖與書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頁 69-76。

40. 王文治，《快雪堂題跋》，收於《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第 10 冊，〈閣帖〉，頁 786。

41. 王昶，〈春融堂書論〉，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雜書聖教序後〉，頁 705。



圖十六：永理，〈臨《淳化閣帖》卷〉(局部)，1803，29.8×467 厘米，遼寧省博物館藏。載《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5 冊，遼 1-661。

十六) 永理書法宗尙歐陽詢 (557-641)，卷中的楷書皆以率更之法爲之，與原帖面貌頗有距離。劉墉與永理二例再一次印證了清人的所謂臨寫，與自我發揮往往只是一線之差。

四、碑學下的餘緒

清代書法發展乾嘉時期，隨著金石考據的盛行而出現了新的觀點，《閣帖》於學古上的價值，亦漸漸受到質疑。例如乾嘉碑帖鑑藏家翁方綱 (1733-1818) 對《閣帖》版本考證有精闢見解，論書亦主張由唐溯晉，惟卻於源頭上重視篆隸古意，於境界上追求雄厚質樸，與姜宸英、陳奕禧、王澐等追求二王流逸蘊藉的風致迥異。(註 42) 傳世有《閣帖》一冊，曾爲翁氏所藏，上有其批注題跋，而卷後寫於嘉慶壬申 (1812) 之跋云：

……然帝王書中自以唐太宗效右軍書足爲後學津梁。就其中如《兩度》、《比者》、《昨日》、《三五日帖》諸跡，學者擇其風骨雄秀，玩索而有得焉。亦足見《閣帖》之資益，如書中之六經。餘則無庸逐一執論矣。(註 43)

42. 有關翁方綱書學，參見朱友舟，《翁方綱書學思想研究》(南京：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05)。

43. 轉引自余彥焱整理，〈翁方綱批注《淳化閣帖》版本之一〉，收於上海博物館編，《《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研究論文稿》，頁 185。

認為《閣帖》於學書有其參考價值。然而，翁氏另有評《閣帖》之語云：“法帖莫先于宋之《淳化閣》，乃開卷略及篆書亦無所考據。又不及隸不及楷，純以草書成編。其草書亦又無考據。世所傳法帖之祖乃草草如此。”^(註 44)對《閣帖》虧於篆、隸、楷書，頗有微言。然而對《閣帖》的地位產生直接影響的，則是阮元（1764-1849）於〈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及其他題跋論書中所提出的觀點。阮元以南北分派，重新建構中國書法史，從而論證北碑的淵源和發展，力求恢復北碑古法。對於《閣帖》，阮元提出了不少批評。^(註 45)首先，《閣帖》的出現導致北派書法式微：「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微矣。」^(註 46)其次，《閣帖》失真嚴重，書蹟不足為據：「王著摹勒《閣帖》，全將唐人雙鉤響揚之本畫一，改為渾圓模稜之形……何以王、郗、謝、庾諸賢與王著之筆無不相近？可見著之改變，多不足據矣。」^(註 47)此外，《閣帖》二王書蹟，全無隸意，不足以代表六朝書風：「今《閣帖》如鍾、王、郗、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惟帖是尚，字全變為真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註 48)阮元於當時學術圈地位崇高，其「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的理想，在一呼百應下，終得實現，碑學書法亦於清代後期盛極一時，而在新的書史觀下，《閣帖》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註 49)阮元好友錢泳（1759-1844）便發揮其南北分派之說，認為書法有碑榜與翰牘兩條路，對於《閣帖》，並未稱善，甚至評劉墉書法云：「文清本從松雪入手，靈峭異常，而誤於《淳化閣帖》，遂至模稜終老。」^(註 50)此種評語，相信劉墉亦始料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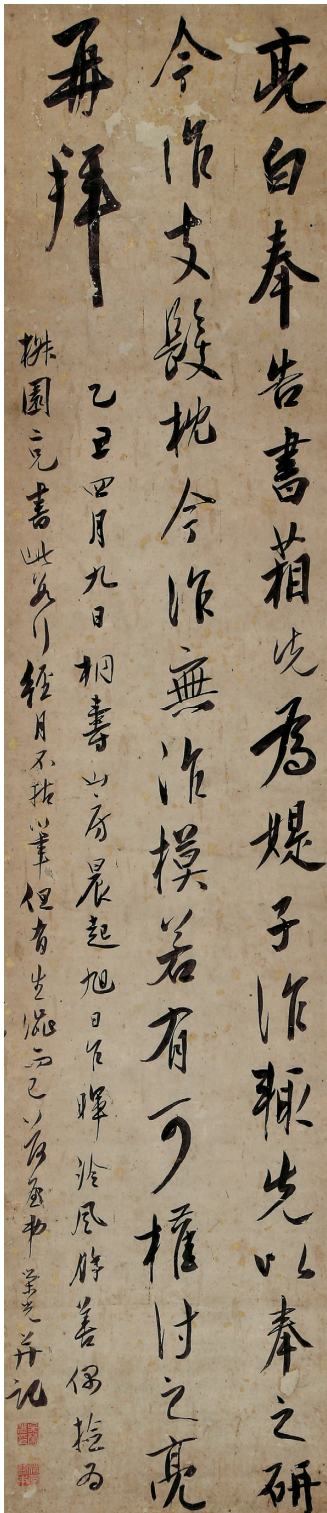
清代後期碑學書法盛行，不少書家評論《閣帖》時，都是以阮元的觀點為基

-
44. 翁方綱著，翁單溪原筆校訂，《蘇齋筆記》（東京：古典刊行會，1933），卷 16，頁 2b-3a。
 45. 有關阮元對《閣帖》的看法，可參見金丹，〈阮元與《淳化閣帖》〉，收於上海博物館編，《《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研究論文稿》，頁 175-181。
 46. 阮元，〈南北書派論〉，收於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下冊，頁 630。
 47. 阮元，《學經室三集》，卷 1，〈復程竹齋編修邦憲書〉，載鄧經元點校，《學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再版），下冊，頁 601。
 48. 阮元，〈北碑南帖論〉，收於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頁 636。
 49. 阮元，〈南北書派論〉，收於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頁 634。
 50. 錢泳，〈履園叢話〉，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頁 628。有關錢泳書學的討論，參見陳雅飛，〈乾嘉幕府的碑帖風尚——以錢泳為視角〉，收於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147-180。

礎。(註 51) 例如何紹基在題跋一件《閣帖》拓本時，不但沒有從鑑藏的角度對該拓本得以傳世表示珍惜，更發表了個人不滿《閣帖》的見解。(註 52) 其中有關《閣帖》的鈎摹出於一手，以至古法湮沒的抨擊，崇唐碑抑宋帖的觀點，以及上溯篆分本源的主張，便是承接阮元的書學而加以發揮。何氏甚至就該《閣帖》拓本說：「此帖雖佳，止可于香爐茗碗間偶然流玩，及之如花光竹韻，聊可排悶耳。」(註 53) 前人得一佳拓，必如獲至寶，而何紹基只以之為可以排悶之物，雖或是極端之言，但亦可見時風的改變。下至晚清康有為（1858-1927），其《廣藝舟雙楫》洋洋大觀，充份闡述了康氏以「變」為中心的書學，並發揮了阮元以來揚碑抑帖的觀點，於當時最具代表性。按康氏「尊碑第二」所論云：「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鈎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註 54) 故《閣帖》之價值，已及不上眾多無名氏的南北朝碑刻。事實上，《廣藝舟雙楫》直接提及《閣帖》之處並不多，此亦可見康氏對《閣帖》的輕視。於「行草第二十五」中，康氏談及《閣帖》時更說：「帖以王著《閣帖》為鼻祖，佳本難得，然賴此見晉人風格，慰情聊勝無也。」(註 55) 與何紹基的「聊可排悶」之語可謂前後輝映。

在清後期碑學勃興下，《閣帖》漸失昔日光采是大勢所趨。目前所見清後期書家臨寫《閣帖》的作品數量，亦不及以往。雖然如此，《閣帖》作為彙帖之祖，其持續的影響力亦不容忽視。從鑑藏研究的角度看，《閣帖》的宋拓本一直是書家夢寐以求之物，收藏《閣帖》佳拓不僅可以滿足好古之心，更可從中考證古代書法源流，認識書法傳統。若就書家的學古來說，雖然碑版金石成為了臨池新貴，但《閣帖》並沒有完全受到摒棄。首先，《閣帖》一直是書家臨池的範本，這種學書

-
51. 有關清代後期書家對《閣帖》的點評，可參考曹建，《晚清帖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 19-40。
 52. 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續修四庫全書》第 1529 冊），卷 10，〈跋張滄山藏賈秋壑刻閣帖初拓本〉，頁 21-22。
 53. 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卷 10，〈跋張滄山藏賈秋壑刻閣帖初拓本〉，頁 22。
 54.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收於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頁 754-756。
 55.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收於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頁 858。



習慣自有其延續性，即如同樣倡碑的包世臣，亦曾於專注學碑前努力學習《閣帖》：「余得南唐〈畫贊〉、棗版《閣本》，苦習十年，不得真解，乃求之〈琅邪台〉、〈郟閣頌〉、〈乙瑛〉、〈孔羨〉、〈般若經〉、〈瘞鶴銘〉、〈張猛龍〉諸碑，始悟其法。」^(註 56)其次，對於醉心於魏晉傳統的書家，《閣帖》即使失真，仍是領略二王書法的重要參考。例如吳榮光(1773-1843)一生嚮往「山陰書派」，對於二王書法的追求不遺餘力，在其鑑藏《閣帖》的過程中，不斷摩挲研究，對帖臨寫自是不在話下。^(註 57)吳氏書法純走晉唐路線，傳世的一件吳氏行書立軸，書於嘉慶十年(1805)，是臨寫《閣帖》卷三的庾亮〈書箱帖〉，風格俊美溫婉，略保留原帖面貌，說明其以六朝為宗的取向，亦反映《閣帖》於其學古中佔上一席位。(圖十七)此外，從書體方面來看，即使碑學崛興，但碑版金石始終是篆、隸、楷書，未可兼及行草。正如阮元說：「是故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註 58)雖然嘉道時已有以碑榜之書作啓牘者，亦有以行草書者

圖十七：吳榮光，〈臨王羲之〈書箱帖〉〉，1805，126.5×27.5 厘米，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56. 包世臣，《藝舟雙楫》，收於祝嘉，《藝舟雙楫疏證》(香港：中華書局，1978)，〈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頁 135。
57. 有關吳榮光的研究，見楊說，《帖學的反思——吳榮光(1773-1843) 書學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9)。
58. 阮元，〈北碑南帖論〉，收於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頁 637。阮元此說提出後即為人所認同，如錢泳便承其說曰：「長箋短幅，揮灑自如，非行書草書不足以盡其妙；大書深刻，端莊得體，非隸書真書不足擅其體。」見錢泳，〈履園叢話〉，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頁 626。

必宗篆隸的主張，但清人學習行草書，還是不能完全摒棄《閣帖》。當時梁章鉅（1775-1849）便說：「學行草書，須熟摹《淳化閣帖》及懷仁〈聖教序〉、孫虔禮〈書譜〉，則晉、唐人之筆意已備。」^(註 59)即使倡導北碑的包世臣論學書之法，亦沒有遺忘《閣帖》，主張先從唐楷入，遍臨諸家後，「乃由真入行，先以前法習褚〈蘭亭〉肥本，筆能隨指環轉，乃入《閣帖》。」^(註 60)康有為於《廣藝舟雙楫》中雖力推北碑，但仍不能不於「學敍第二十二」中說：「書體既成，欲為行書博其態，則學《閣帖》，次及宋人書……」，承認《閣帖》於行書上的價值。^(註 61)

另一方面，雖然不少清代後期書家崇碑抑帖，甚至以篆隸源頭來重新思考二王書風，但學碑者兼學帖的情況相信普遍存在。就以認為《閣帖》只「聊可排悶」的何紹基來看，雖則曾說出「早窺古意薄羲獻」的豪語，並謂「余學書從篆分入手，故於北碑無不習，而南人簡札一派不甚留意」，仍不免云：「我雖微尙在北碑，山陰斐几羸亦窺」，未敢輕視二王傳統。^(註 62)固然傳世不見有何氏臨寫《閣帖》之作，但何氏曾得見〈定武蘭亭〉而「至為心醉」，亦嘗臨寫右軍〈蘭亭序〉與〈聖教序〉。^(註 63)當然，在何紹基眼中，涉獵右軍的經典書蹟與崇尙北碑並無矛盾，因為他認為「山陰實兼南北派書法之全」，但無論如何，二王傳統終不可棄。^(註 64)雖然何紹基對《閣帖》沒有興趣，認為其「檢擇不盡精，真贗相半」，但相信《閣帖》於其他兼學帖的碑學書家而言，仍有一定的吸引力。^(註 65)嘉道時的吳熙載（1799-1870）乃金石潮流下的名家，其傳世作品中便有《閣帖》的臨寫，筆力沉厚凝重，異於原帖揮灑流逸之態。（圖十八）晚清時楊守敬（1839-1915）曾說：「宋之《淳化閣帖》，匯為巨觀，然真偽雜糅……然歷代名跡多載其中，神理雖亡，匡廓猶存。」^(註 66)雖不是推崇備至，但對《閣帖》的價值還是有所肯定。

59. 梁章鉅，〈退庵隨筆〉，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頁 808。

60. 包世臣，〈藝舟雙楫〉，收於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頁 669。

61.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收於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頁 851。

62. 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卷 9，〈跋國學蘭亭舊拓本〉，頁 1；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卷 20，〈題雨舫所藏聖教序第二本〉，頁 10。

63. 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卷 9，〈跋國學蘭亭舊拓本〉，頁 1；其《臨〈蘭亭序〉》書蹟見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北京：榮 444 寶齋，1994），卷 70，〈何紹基〉，圖版 81。

64. 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卷 9，〈跋宋刻十七帖〉，頁 5。

65. 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卷 9，〈跋宋刻十七帖〉，頁 5。

66. 楊守敬，〈書學邇言〉，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 723。



圖十八：吳熙載，〈臨《泉州本閣帖》〉，1808。載《吳讓之臨閣帖》。

五、餘論

清代書家對《閣帖》相信是又愛又恨。《閣帖》的經典性固然是無可爭議，但其偽蹟與失真的問題卻不能否認。從清初的高潮到後來的「由盛轉衰」，《閣帖》於清代經歷了高低起伏，但正如近年的研究指出，晚清碑學盛行，惟帖學書法依然佔有一定的位置，故《閣帖》始終沒有受到摒棄。^(註67)綜觀《閣帖》於清代的命運，有幾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清代書家一直以創造性的臨古方法學習《閣帖》，從而各取所需，各自演繹，《閣帖》真偽與刻工的缺憾，並無窒礙書家學古與性情

67. 見曹建，〈晚清帖學研究〉，頁19-40。

的發揮，故不但沒有受到摒棄，更於清代前期成為書家學古的重要依據。清人臨寫《閣帖》無疑是極佳例子，說明中國文人藝術中臨摹與自運、傳統與個性、範本與創作之間的模糊關係。

其二，《閣帖》的佳拓一直是書家鑑藏的無上珍品，而對於拓本的觀摩，又是書家趨古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書家就《閣帖》中古帖進行考證與觀摩，往往便是一種承傳魏晉傳統的過程。前人學古，除了臨摹外，亦重視觀帖，清人亦不例外，如楊賓所說：「余生平論學書，要執筆正心。原不要摹帖，但恐危而未安，亦須取六朝以前及初唐法帖，時時諦觀，以印証之。」^(註 68)清人對《閣帖》的鑑賞一直歷久不衰，其間的潛移默化，不難想像。

其三，清人臨寫《閣帖》，情況不一。從臨摹而學古固是常規，但卻並非必然。王鐸與傅山常以臨寫《閣帖》作酬應之用，一方面取其簡短便捷，同時亦相信與《閣帖》的經典性相關。況且，目前傳世的清人《閣帖》書蹟，並不盡是「臨摹」，其中不少只是以《閣帖》文字作為依托，從而自行發揮，《閣帖》彷彿成為了理所當然的題材，可為作品增添古雅。這些臨寫方式於清前期最為常見，足見《閣帖》的經典性與普及程度。近年學術界對文人交往中的酬應書法開始關注，《閣帖》的角色，無疑是清代酬應書法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部分。^(註 69)

其四，《閣帖》的盛行，一直與書家崇尚二王傳統的取向息息相關，但清代後期臨寫《閣帖》的風氣減退，卻不必視為二王傳統的式微。阮元以南北分派重構書法傳統，並強調正行草書實源自漢魏隸體，而二王書法本有隸意，只是《閣帖》所載皆短箋尺牘，無復隸古之意。這種書史觀於清後期廣為書家接受，何紹基「山陰實兼南北派書法之全」的觀點，即源於此。可以說，二王書法只是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其經典地位並不因此而有所動搖，惟《閣帖》已不再是追溯二王傳統的必然範本而已。在講究傳承的書法藝術中，如何理解傳統是至為重要之事，在清代碑學興起的個案中，二王書法被重新詮釋，由是影響了書家臨池學古的選擇，

68. 楊賓，〈大瓢偶筆〉，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 562。

69. 近年有關酬應書法的研究，除了註 16 所列白謙慎的著作外，亦有何炎泉，〈張瑞圖（1570-1641）行草書風之形成與書法應酬〉，《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9（臺北：2005），頁 133-162；柳揚，〈應酬——社會史視角下的清代士人書法〉，收於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97-127。2008 年 11 月 1-2 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行「筆墨之外：中國書法史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亦有兩篇論文與應酬書法相關，包括何炎泉的〈張瑞圖《果亭翰墨》帖與書法應酬〉及薛龍春的〈應酬·受書人·觀看與表演——關於王鐸應酬書寫的思考〉。

而《閣帖》的命運，實可為了解傳統、學古、變革等的相互關係提供參考。

最後，《閣帖》是歷代書家學習行草書的重要範本，清代後期書法崇尚金石碑版，重視篆隸源頭，雖然《閣帖》於行草書的角色未被完全摒棄，但此消彼長，清代前期蔚為奇觀的行草書終無以為繼。楊守敬曾指出：「余以為篆隸古樸，誠不能舍漢、魏碑碣別尋蹊徑；而行草精妙，又何能舍山陰、平原誤入歧途。」^(註 70)認為篆隸與行草各有師法源頭，並提出「故集帖之與碑碣，合之兩美，離之兩傷」的看法，然而時風所及，不少書家還是以篆隸筆法書寫行草。^(註 71)楊氏又評清代書法謂：「國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則超軼前代直接漢人」，確道出了歷史事實。^(註 72)清人對《閣帖》的取捨實關乎行草書法的盛衰，難怪後來有論者對尊碑抑帖之說提出異議。^(註 73)事實上，民國時期碑帖兼融的書家大不乏人，即使是康有為亦於晚年追求集北碑南帖之大成。^(註 74)由此可見，在講究學古變古的中國書法傳統中，《閣帖》於清代雖然經歷了不尋常的起伏，但亦未嘗沒有歷久常新的價值。

70. 楊守敬，《晦明軒稿》，收於謝承仁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5冊，〈集帖目錄序〉，頁1184。

71. 楊守敬，《楊守敬集》，第8冊，〈激素飛清閣評帖記序〉，頁585。

72. 楊守敬，〈書學邇言〉，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714。

73. 其中如劉咸忻於1930年成書的《弄翰餘瀋》，便曾對康有為的尊碑說提出批評。見劉咸忻著、楊代欣評注，《弄翰餘瀋》（成都：巴蜀書社，1991），頁20-58。

74. 康有為在其晚年的《天青七言聯》上題云：「自宋後千年皆帖學，至近百年始講北碑。然張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鄧完白寫南碑漢隸而無帖，包慎伯全南帖而無碑。千年以來，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況兼漢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謬欲兼之。」見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卷78，〈康有為、梁啟超、羅振玉、鄭孝胥〉，圖37。該七言聯現藏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 昶，〈春融堂書論〉，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703-710。
- 王文治，《快雪堂題跋》，收於《中國書畫全書》，第 10 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
- 王剛潛，〈清人書評〉，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803-845。
- 王澐，〈竹雲題跋〉，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598-638。
- ，〈虛舟題跋〉，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639-672。
- ，〈翰墨指南〉，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頁 952-631。
- 包世臣，〈藝舟雙楫〉，收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頁 640-679。
- 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續修四庫全書本。
- 阮 元，〈北碑南帖論〉，收於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頁 635-637。
- ，〈南北書派論〉，收於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頁 629-635。
- 著，鄧經元點校，《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再版。
- 姜宸英，〈湛園書論〉，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頁 462-472。
- 翁方綱著，翁單溪原筆校訂，《蘇齋筆記》，東京：古典刊行會，1933。
- 翁振翼，〈論書近言〉，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頁 521-527。
-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收於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頁 748-868。
- 梁章鉅，〈退庵隨筆〉，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頁 804-813。
- 陳奕禧，〈綠陰亭集〉，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頁 474-492。
- ，〈隱綠軒題識〉，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頁 492-501。
- 傅 山，《霜紅龕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續修四庫全書本。
- 楊 賓，〈大瓢偶筆〉，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448-596。
- 楊守敬，〈書學邇言〉，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712-743。
- 劉咸炘著，楊代欣評注，《弄翰餘瀋》，成都：巴蜀書社，1991。

錢 泳，〈履園叢話〉，收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頁 615-628。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續修四庫全書本。

謝承仁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二、近人論著

上海博物館編，《《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研究論文稿》，上海：上海博物館，2003。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尹一梅，〈故宮藏懋勤殿本《閣帖》研究〉，收於何碧琪編，《祕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 1010 年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3，頁 101-112。

——編，《懋勤殿本淳化閣帖》，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

白謙慎，〈從傅山和戴廷枏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上、下）〉，《故宮學術季刊》，16.4，臺北：1999，頁 95-133；17.1，臺北：1999，頁 137-156。

* ——，《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臺北：石頭出版社，2004。

仲威、沈傳鳳，《古墨新研——《淳化閣帖》縱橫談》，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出版社，2003。

朱友舟，《翁方綱書學思想研究》，南京：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05。

朱惠良，〈臨古之新路——董其昌以後書學發展研究之一〉，《故宮季刊》，10.3，臺北：1993，頁 61-94。

* ——，《董其昌法書特展研究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何炎泉，〈張瑞圖（1570-1641）行草書風之形成與書法應酬〉，《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9，臺北：2005，頁 133-162。

——，〈張瑞圖《果亭翰墨》帖與書法應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主辦，「筆墨之外——中國書法史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2008 年 11 月 1-2 日。

何傳馨，〈王澐《積書巖帖》及其書學初探〉，收於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文物館，2008，頁 425-447。

* 何碧琪，〈佛利爾本《淳化閣帖》及其系統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0，臺北：2006，頁 19-78。

李潤桓，〈傅山書藝與《閣帖》〉，收於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文物館，2008，頁 375-395。

余彥焱整理，〈翁方綱批注《淳化閣帖》版本之一〉，收於上海博物館編，《《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研究論文稿》，上海：上海博物館，2003，頁 182-185。

金 丹，〈阮元與《淳化閣帖》〉，收於上海博物館編，《《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研究論文稿》，上海：上海博物館，2003，頁 175-181。

* 施安昌，〈清朝內府藏《淳化閣帖》〉，收於何碧琪編，《祕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 1010 年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3，頁 113-121。

* 柳 揚，〈應酬——社會史視角下的清代士人書法〉，收於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文物館，2008，頁 97-127。

容 庚，《叢帖目一》，香港：中華書局，1980。

祝 嘉，《藝舟雙楫疏證》，香港：中華書局，1978。

曹 軍，〈王鐸與《閣帖》〉，收於上海博物館編，《《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研究論文稿》，上海：上海博物館，2003，頁 150-155。

- * 曹建，《晚清帖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 * 莫家良，〈南宋刻帖文化管窺〉，收於游學華、陳娟安編，《中國碑帖與書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頁 69-76。
- * ——，〈《淳化閣帖》與書法臨古〉，收於何碧琪編，《秘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 1010 年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3，頁 182-198。
- 、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文物館，2008。
- * 陳雅飛，〈乾嘉幕府的碑帖風尚——以錢泳為視角〉，收於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文物館，2008，頁 147-180。
- 黃惇選注，《董其昌書法論註》，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33。
- 黃思源編，《王鐸書法全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
- 楊說，《帖學的反思——吳榮光(1773-1843)書學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所博士論文，2009。
- 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卷 70，〈何紹基〉，北京：榮寶齋，1994。
- ，《中國書法全集》，卷 78，〈康有為、梁啟超、羅振玉、鄭孝胥〉，北京：榮寶齋，1993。
- 薛龍春，〈應酬·受書人·觀看與表演——關於王鐸應酬書寫的思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主辦，「筆墨之外——中國書法史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2008 年 11 月 1-2 日。
- 村上三島編，《王鐸の書法》，〈冊編〉，東京：二玄社，1998。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ai, Qian-shen. *Fu Shan de Jiaowang he Yingchou: Yishu Shehuishi de Yixiang Ge'an Yanjiu* (*Fu Shan's social life: a cas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of art*). Shanghai: Shanghai Shuhua Chubanshe, 2003.
- . *Fu Shan de Shijie: Shiqi Shiji Zhongguo Shufa de Shanbian* (*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c., 2004.
- Cao, Jian. *Wanqing Tiexue Yanjiu* (*A study of late Qing model-calligraphy*). Tianjin: Tianjin Renmin Meishu Chubanshe, 2005.
- Chen, Ya-fei. "Qian-Jia Mufu de Beitie Fengshang: Yi Qian Yong Wei Shijiao (The interest in stele and model-calligraphy of the private secretariats of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in the perspective of Qian Yong)," in Kar-leung Mok and Ya-fei Chen eds., *Shuhai Guanlan Er: Yinglian, Tiexue, Shuyi Guoji Yantaohui Lunwenji* (*Looking at the sea of calligraphy 2: collected essay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couplets, Tie-rubbings, and Calligraphy*).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 Art Museu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pp. 147-180.
- Chu, Hui-liang. *Dong Qichang Fashu Tezhan Yanjiu Tulu* (*Special exhibition of Dong Qichang's calligraphy*).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993.
- Ho, Pik-ki Peggy. "Folierben Chunhuage Tie jiqi Xitong Yanjiu (A study on the *Chunhuage Model Letters* in the Freer Gallery and its related versions)," *Guoli Taiwan Daxue Meishushi Yanjiu Jikan*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20, 2006, pp. 19-78.
- Liu, Yang. "Yingchuo: Shehuishi shijiao xia de Qingdai Shiren Shufa (Networking: calligraphy of Qing literati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 in Kar-leung Mok and Ya-fei Chen eds., *Shuhai Guanlan Er: Yinglian, Tiexue, Shuyi Guoji Yantaohui Lunwenji* (*Looking at the sea of calligraphy 2: collected essay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couplets, Tie-rubbings, and Calligraphy*).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 Art Museu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pp. 97-127.
- Mok, Kar-leung. "*Chunhuage*" Tie yu Shufa Lingu (*Model-calligraphy of the Chunhua Archive and the practice of copying in calligraphy*)," in *Mige huangfeng: Chunhuage Tie Kanke 1010 Nian Jinian Lunwenji* (*The grand imperial archive: collected essays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10 anniversary of the carving of Model-calligraphy of the Chunhua Archive*). Hong Kong: Art Museu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pp. 182-198.
- . "Nansong Keti Wenhua Guankui (A discussion of the culture of tie-carv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Hok-wa Yau and Kuen-on Chan eds., *Zhongguo Beitie yu Shufa Guoji Yantaohui Lunwenji* (*Collected essay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hinese stone engraving and calligraphy*). Hong Kong: Art Museu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pp. 69-76.
- Shi, An-chang. "Qingchao Neifu cang Chunhuage Tie (*Model-calligraphy of the Chunhua Archive* in the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 in *Mige Huangfeng: Chunhuage Tie Kanke 1010*

Nian Jinian Lunwenji (The grand imperial archive: collected essays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10 anniversary of the carving of Model-calligraphy of the Chunhua Archive). Hong Kong: Art Museu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pp. 113-121.

Model Calligraphy of the Chunhua Archive and Modeling on the Past in Qing Calligraphy

Mok, Harold Kar-leung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Chunhuage Tie (Model Calligraphy of the Chunhua Archiv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odel for calligraphers since its production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Widespread and far-reaching, its influence has been phenomena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roughout the ages, it has been looked upon as the epitome of revivalist ideals by innumerable calligraphers, who imitate, interpret, and reinterpret the Jin tradition while copying this anthology of calligraphy. In fact, the prevalence of this anthology was a catalys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Model-Calligraphy School in the Jin tradition. Its influence receded in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as repeated re-carvings eroded the credibility of available versions at a time when the Stele School of calligraphy was on the rise. This essay attempts to trac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hunhuage Tie* from the early Qing through the mid-and late Qing. To put the discussion in its proper context, the Qing views on copying ancient masterpieces, the study of calligraphic works, and calligraphic history are analyzed in rel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l-Calligraphy School.

Key words: *Model Calligraphy of the Chunhua Archive*, Qing calligraphy, copying in calligraphy